

日治末期臺灣的教育政策： 以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為中心*

許佩賢**

摘 要

本文以《茗荷谷文書》的檔案及報章雜誌的報導為主要材料，藉由義務教育制度施行的討論為中心，嘗試描繪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的教育政策的決策過程及地方社會的教育狀況。

義務教育自日本領有臺灣以後即不斷被提出，並於 1922 年第三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做成終將施行的決議，但是真正做為政策課題是要到 1930 年代以後，其背景之一是 1935 年地方自治選舉的實施，讓臺灣總督府及地方指導者感到加速普及教育的迫切性。1938 年在戰爭動員的人力資源考量下，正式起動各項準備工作。首先是在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設置新的「調查係」，專職負責義務教育相關事項的調查。翌年 10 月提出義務教育施行草案，經地方長官意見交換會討論後，向總督府評議會提出諮詢，得其同意後，公布「義務教育實施要綱」，便開始進行與日本中央協商、財政規劃、及法令修改等準備工作。1941 年，臺灣與日本內地同步施行國民學校制度，義務教育則如預定，於 1943 年起實施。

義務教育於戰爭末期的實施，從統治者方面來看，無疑是為了配合戰爭動員的需要，特別是預想徵兵制必將施行，而期待透過擴大基礎國民教育來培養國家所需的人力資源。另一方面，臺灣社會自 1920 年代的民族運動以來，即從啟蒙主義的觀點主張應在臺灣施行義務教育；1930 年代後期總督府再度提出義務教育的政策課題時，臺灣社會很機靈地借用統治者的說詞，來提出義務教育的要求。從 1939 年公布到 1943 年實施的 3 年半準備期間，各地方確實用很快的速度擴充教育設施。教育擴充的財政基礎主要是來自國庫補助，但是，實際上，還是有相當的部分是出於渴求更多教育機會的地方民眾。

關鍵詞：義務教育、《茗荷谷文書》、教育財政、教育擴充、國民學校

*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日治末期的戰爭動員與學校教育（1937-1945）」（NSC97-2410-H-003-145-MY2）之部分成果。部分內容曾發表於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主辦之「東亞知識交流與歷史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 年 12 月 5-6 日。此次刊出，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來稿日期：2012 年 9 月 13 日；通過刊登：2012 年 12 月 20 日。